

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讲座教授夏含夷： 我们对中国古代的了解只是一小部分

本报记者 于颖

重新思考古代文献 是怎么写成、流传的



文汇报：首先冒昧地想跟您聊一聊您的名字，容易让人联想到华夏、夷狄的概念，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夏含夷：很多人都对我的名字表示过好奇，其实最初比较简单，基本按照姓名 Shaughnessy 发音来的。最早教我中文的老师，给了我一个不是很好的“桑”姓，比较少见，跟“丧”同源，“桑爱德”听着就像是一个女孩子名字。“夏含夷”是我自己起的，或许有一些意思，但没有什么政治因素。我当时对道教很感兴趣，发现唐朝有个“含夷”道士。“夷”也有平夷、稳定之意，比较符合我的个人性格，不太容易受到外界干扰。

文汇报：《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英文版成书有20年了，之后中文版在台湾发行，这次又再版简体字版，一次次回顾这8篇文章后，您会有新的感受吗？

夏含夷：这本论文集里的一些文章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初，那时我还是研究生。2013年在台湾出中文版时，我就说过，再来看这些论文时，内容都比较熟悉，但似乎有种不太认识作者的感觉。主要有两方面因素，第一个就是时间一直在改变，二三十年前的人、那个时候的兴趣，都和现在不一样；第二个就是翻译的问题。中文一般都是我自己写，8篇文章基本都已经在中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了，当时觉得没有必要再出集子。但台湾“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林庆彰老先生非常友好，坚持要出这本书，还表示要从头到尾翻译一遍。

初步的翻译结果不是很满意，可以说，我看到第一稿时几乎要哭了，后来花了几个月时间，一个字一个字地改，再寄回去。他们也用了一年时间作修改，到第二稿时，有些地方改过来了，但仍然不是很理想。之后又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才最终完成，基本反映出了我的真实

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美国汉学家，曾师从爱新觉罗·毓璠和汉学家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学习文言文和古文字，长期从事中国上古历史文化、古文字出土文献的研究。代表作品有《古史异观》《温故知新录：商周文化史管见》《孔子之前：中国经典的创造研究》《重写中国古代文献》《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等。

20世纪初，中国国内产生了“古史辨”派的疑古运动，西方汉学也受到了影响，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的作品上，或对早期文献只作语言学的考察。而夏含夷认为，一方面，从同时代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当时中国已发展出相当成熟的书写文化；另一方面，能确认为西周创作的文献中也有关于“简书”“册”等的记录。他一反西方汉学的传统，把目光放到了中国早期文献上，相关研究成果在1990年代末汇为《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

2013年春，中文版的《孔子之前》在中国台湾出版；今年9月，上海中西书局推出简体版本，让这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早期文献的代表作得以跟更多中国读者见面。应上海中西书局、海上博雅讲坛的邀请，夏先生来沪作“《孔子之前》之后的再反思”的讲演，并接受了《文汇报》的采访。

内容。但你知道，每个人的中文表述都不一样。我的中文可能不怎么样，但那就是我的表达，跟他们的肯定不一样。

其实这些文章原先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他们的基本知识和中国读者的基本知识不同，必须说得比较清楚，查证、查实一些基本事实。但用中文写给中国人看就大可不用这样，但当时出版社全翻译了，就会有一点怪。

不知道是自己笨，还是有点骄傲，这8篇文章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站得住脚的，最重要的结论基本上都对，方法也是我惯用的。当然，有一些细节还是可以改的。

文汇报：中国现在出土的新材料层出不穷，西方学者会不会追踪这些？多年来，他们对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方向和兴趣点有没有什么变化？

夏含夷：有变化也可能是消极而非积极的变化。19、20世纪前半段，现在说的中国学、汉学，基本针对的就是经典、古代的思想，但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大多关注近现代。这是一个基本改变。你看美国大概有50多所大学有汉学系，有点历史的、比较重要的有十几所。过去每一所肯定会有两三个人在做中国古代，只

有一个人可能会对近现代的文学、历史感兴趣，但现在完全反过来了，几乎所有的汉学家都做近现代的了。

研究古代的也有改变，这50年以来最重要的恐怕还是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1970年代，马王堆、安阳妇好墓、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兴趣，也会影响到研究古代的方法。过去研究《论语》《老子》《庄子》，现在物质文化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佛教唯识论，有一些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才有价值，对他们来说，新出土的东西不一定那么重要。当然，我的圈子都比

较重视新材料的发现，但这个圈子比较小，大概不会超过50个人。

文汇报：同其他西方学者相比，您较早就将目光放在中国早期文献上，也长期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那您如何看待裘锡圭先生一直在倡导的中国古典学的重建？

夏含夷：裘先生可以说是我最老的朋友了，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我们一直在吵架、辩论，几乎每一次我都会发现，他是对的。并非我总错，主要是他能提出证据。裘先生提倡古典学这很好，其实也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在中国国内，最早可以

追溯到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但在王国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人表示要用几种证据来做研究。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几乎每一个历史学家都知道应该用多重证据。在西方汉学界，比如法国的沙畹从1890年开始写东西，就利用了二重证据法。他在1912年出版的《泰山》就是如此，实地研究了石刻，还利用了传世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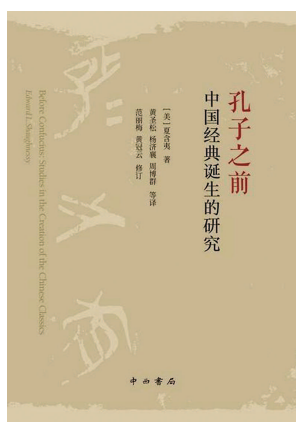
中国古典学经历了几个阶段，1920年代是“疑古”时代，1930年代考古概念进来，1970年代又有那么多重要的发现，1990年代有郭店简、上博简，现在更多，清华简、北大简、安徽简等等，这些都需要一个新的想法。我写那8篇文章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郭店简，也没有想到这些书具体是怎么写作的、怎么创造的。里面只有一篇关于《竹书纪年》的，稍微谈到错简的问题，考虑了形式、样子对内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很赞同裘先生说的要“重建古典学”。我们现在有王国维那时候根本想象不到的证据可以利用，从而可以重新思考古代文献是怎么写的，又是怎么流传的。

文汇报：您刚刚提到了“疑古”，我们都知道李学勤先生有个“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您怎么看“疑古”和“信古”？

夏含夷：李先生当时引用了冯友兰先生的话，但他提出“走出疑古”还是简单了一点，很多人会就此认为“走出疑古”意味着“走进信古”。李先生是

(下转5版) ➔



夏含夷的《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和其他作品中译

